



走夜路

邓有民

写下这个题目,脑海里就闪现出许多相关的场景来。追溯过去的时光,走夜路的经历实在太多,如果不经过一番梳理,那就像电影蒙太奇,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不断变幻、重叠、跳跃、凌乱的。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人,走夜路早已不怕鬼了。但是,我很小的时候是真的怕,因为出生在一个边远的小村庄里,随时随地都可能听到老人们讲的鬼怪故事。这些故事并不逊色于《聊斋志异》的奇幻神秘,甚至在恐怖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为这些农村老人常常讲自己的亲身经历,不由得你不信,不由得你不怕。比如三叔就说过,他有一回走夜路,大约是从木杉河往南形地走,途径桐木庵(地名叫庵,其实没有庵,也许很早以前有吧,只是一个砂石坳)。时,就遭遇鬼撒砂子。鬼从背后向他袭来,他拔腿就跑,鬼在后面追,砂子大把大把地撒到他的后背、脖颈、头发上。他不敢朝后看,拼了命地往前跑,跑过了砂石坳就没事了——鬼也许跟狗差不多,都有它的势力范围。父亲曾经教导我说,走夜路要把上衣纽扣都解开,把胸怀敞出来,每个人都有“火焰山”,生命力越强的人“火焰山”越高,敞开心怀就是把“火焰山”放出来,鬼见了害怕,老远就躲起来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从此我走夜路就习惯把上衣解开,哪怕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。

走夜路记忆最早的一次应该是我六岁那年,母亲带我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去,很远的山路,我们搭乘一辆拖拉机,是那种驾驶室除了司机还可以坐两个乘客的比较大的车辆。也许是因为年龄太小吧,我坐在上面感觉很高,仿佛有几层楼房一样高。山路很崎岖,一边是石壁,一边是悬崖,悬崖下面是很深的沟壑,用万丈深渊来形容也不夸张。我们是吃过晚饭才出发的,天色很快就黑了。但天气很好,湛蓝的天空上镶满了绿宝石一样的星星,山体变得黑黢黢的,像庞然大物一样前后左右地向我扑来,我紧紧依偎在母亲怀里,随着拖拉机的颠簸很快就睡着了。等我睁开眼睛,已经是翌日的早上。父亲在枕边放了许多糖果,我一醒来就发现有这么多花花绿绿的糖果,简直高兴死了,赶忙拿手揉眼睛,看是不是在做梦,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:“吃吧,吃完了还有哩!”

母亲住一天就回去了,要赶回去料理家务。我留了下来,呆了一个暑假。父亲在供销社上班,我整天倚在柜台边看外面的街景,当暴雨来临时,雨点像箭一样射在砂石路面上,激起一层烟雾,那场景很有气势,我至今印象深刻。父亲怕我无聊,想方设法地陪我玩,他用小木帮我削了许多玩具,有陀螺、抽水筒、纸浆竹炮、小木偶、风筝、纸飞机等。他晚饭后还去溪河里捕鱼,捉螃蟹给我玩。我去的时候很兴奋,晚风吹在脸上很凉爽,溪河里的水清澈见底,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铺满了河床,有的完全浸泡在水里,有的一半在水里一半裸露在岸边,有的则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白天被太阳晒得滚烫发白,晚上在月色星光的滋润下变得光滑湿润,赤脚踩在上面,亲如肌肤。我跟在父亲背后,看他撒网,拖网,解鱼,把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鲫鱼、青背刀、黄角鱼、白条鱼放进我提着的竹篓里,鱼进了竹篓还不甘心,不停地蹦跶,水珠溅到我的脸上,有一股刺鼻的腥味。父亲过河的时候就背着我们,我们不知跨越了多少次河滩沟壑,渐渐地我的眼皮开始打架,伏在父亲宽厚的背上睡着了。等我醒来时又是翌日的早上了。父亲把昨夜抓来的螃蟹放进堆着石头的水盘里,我可以一个上午看它们爬来爬去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走夜路的机会越来越多。我记得上初中后,父亲就提前退休了,他把工作让给了二姐(那时,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工作,父亲退休,二姐就分配了工作,成了一名国营企业的职工。)父亲五十七岁,身体很好,他回到老家上山开荒,在山上种苞谷、红苕、麦子、高粱、大豆、油麻、燕麦、花生、油菜、西瓜、香瓜

……我放学后经常上山帮父亲干农活。父亲上山干活是“两头见星星”——天没亮上山,天黑透了才收工,我跟着他走了不少夜路。走夜路可不是空脚撂手哦,要挑一担东西,不是收获的庄稼,就是用作燃料的柴草。父亲、大哥、二姐的担子都有百多斤重,我的轻一些也有好几十斤。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天气好的时候,有月光照着还好。如果碰上风雨交加的夜晚,就惨了,天色黑漆漆地伸手不见五指,脚下根本看不见路,全凭感觉在走,父亲走在前面,我们跟在后面,高一脚低一脚,雨水、汗水混在一起顺着额头、脸颊、脖颈直往下淌,淋湿的担子越挑越重,我一不小心踩进了“牛脚窝”(水牛在雨天走过时留下深深的泥水窝)里,半天拔不出脚,使劲拔出来了,鞋子嵌进了泥里,我只好蹲下来用手去泥巴里抠。十几岁的我终于忍不住哭哭了。

父亲不但不帮我,反而大声斥责我,一个男人哭什么!没出息!我又累又饿又委屈,任凭雨水、汗水、泪水在我的脸上纵横交错地流,全身早已像落汤鸡一样了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我竟然一点也没有怨恨过父亲,如今父亲在他劳作的山上已经长眠二十九年了,我对他的思念越来越多,并且与日俱增。

我后来外出求学,走夜路的机会就减少了。直到大学毕业,我分到一所山下中学教书,常常因为家访而走夜路。走的回来是山间小路,田野的风吹在脸上,混杂着花香、草气、松脂和田里新翻开的泥土味道,感觉十分亲切。跟我一起走的还有唐君,他是西南民院毕业的,我俩同一年分到学校教书,他教数学,我教物理和语文,他当一班的班主任,我任二班的班主任,同一个村寨都有我们的学生。那时我们才二十出头,正值青春,精力旺盛,事业心强,我们一家一户地走,返校时已经深夜了。天气好趁着月色星光走,没有月光我们就点亮手上的马灯照路。夏天走得很凉爽,金银花的香味透过厚厚的夜色扑面而来,常常勾起我的思乡之情。一弯新月斜斜地挂在天边,星空下是黑黢黢的大山,山峦起伏紧贴贴在靛蓝的天边,像极了黑色的波涛,有时那弯弯的月就挨着山峦,像极了一只只白色的小船飘荡在黑色的波涛上。这么有意象的场景自然会引发我们的诗兴,那时我们很喜欢文学,也算是文艺青年了,只是还没有作品问世。

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论文学,兴致高时还念几句打油诗。那天,刚好我累了脚,走路一瘸一拐,而他正患耳膜炎,听力下降。他吟诗打趣我道:

“跛脚先生看月歪,高低一路荡船来。”

他吟罢哈哈大笑,害怕我“报复”便“撒趟子”往前一溜烟跑了,我叫他不应,转眼就拐过前面山坳去了。我紧跟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追,哪里追得上?这时,从前方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,我知道他在前面吹笛等我哩。待转过山坳,果然见他坐在路边一块大青石上吹笛,淡淡的月光洒在他身上,像下了一层薄霜,霜线将他的轮廓清晰地勾勒出来,像一幅剪影,生动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说,你跑什么呀?喊你也不应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,意思是听不见。我笑道:

“可怜同伴耳生疾,万唤千呼也不回!”把刚才他那两句打油诗联上了。我们相视抚掌大笑,回到学校已经是后半夜了。

还有一次大雪过后,天色放晴,入夜气温还保持零下,积雪冻如白铁。天上一轮明月,地上一层白雪,天地一白,交相辉映,加上夜色阑珊,更显得诗情画意。好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!唐君酒量难忍,急促打我宿舍门,高声大呼,道兄(我们平时戏称对方为“道兄”)有酒没得?快开门!我开门应道,三更半夜哪里去弄酒来?他说,走!我们去三岔路口打酒去!说罢我们一人提一只马灯,“噗啦!噗啦!”地踩着厚厚的积雪到三里外的小店打酒。老板早已睡熟,半天才被吵醒,躺在被窝里没好气地喝问道:

“是哪个?还让人睡觉没?明天再来买!”

唐君打门大叫:“是我!快开门!”老板把门打开一条缝,见是我们二人,赶忙披了棉衣给我们灌满了酒壶。一路上我们一边喝酒,一边赏雪,直呼痛快痛快!回到学校时,酒已经被我们喝干了,他仍未尽兴,直呼再去打酒!我算了,看这月下雪景,正好吹笛。他二话不说,抄起一根笛子向后山飞奔而去,跑到山坳的一块突兀的大石上坐定,宛转悠扬的笛声打破冰封的尘世,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

后来我调回城里工作,唐君还在那所中学教书。不幸前年传来噩耗,唐君因患脑血管瘤在院手术时死亡,他英年早逝,我震惊之余深感悲痛。

还有一次走夜路让我印象深刻。那是201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我和单位同事老张接到上级紧急通知,连夜赶到杨家坡和三丘田组织部和群众开会,商量和安排脱贫攻坚工作。我负责三丘田组,他负责杨家坡组。我们立马行动,当我赶到三丘田时已是晚上八点钟分了。寒风拂面,道路泥泞,夜如漆黑,我因为高度近视,借着手机微弱的光艰难地走在田埂土坎上,夜空正下着雨夹雪,地上十分湿滑,我一个跟头差点摔下水田里去,黑暗中一双大手将我的两肩用力扶住,才让我站稳了“桩子”,没有滑倒。我正要扭头看是哪个相助,他早已将我一手臂紧紧挽扶住,语气明显带着歉意地说道:“深更半夜的,天气又冷,路又滑,真是辛苦领导了啊!”

我连忙向他道谢,也表明了我不是领导的身份。

“这是我的工作哩。”我说。

说话间,我们已进入了一户人家的灶房,只见火塘里烧着旺旺的柴火,早已围坐了十多个人。他们一看到我进来,都忙站起来让座。我坐下后才发现离火塘较远的灶边也坐满了人,我一边招呼大家都过来挨紧了坐好烤火,一边准备开会。刚才在路上扶我一把的那个人说,我来介绍一下大家吧。他于是一个一个地说了姓名身份,其中有党员干部也有群众代表。我趁他说话的时候,仔细打量了他,发现他非常年轻,大约还不到三十岁,眉目清秀,双眼透着一股聪明劲,他说话很腼腆。等他介绍完了我朝他笑了笑说:

“你怎么不介绍你自己呢?”

大伙都笑了。只见他用手指挠着自己额头前的短发,将头低了下去,脸被火光映得通红了。

“他是我们的队长(村民组长)哩!姓赵。”有人抢先答道。

我笑道:“赵队长,刚才还多亏你呀,要不是我早下田去喽!”说着便正式开会了。会上他一改腼腆的性格,自始至终都积极发言。在他的带动下,大家都敞开心扉,畅所欲言,气氛融洽而热烈。等老张从杨家坡赶过来时,我们的会议还没有结束。散会后,我把赵队长留下来单独又谈了一会儿,还留了电话,加了微信,说今后工作上多联系吧。在后来几年的扶贫岁月里,我们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每每回忆起这些走夜路的经历和故事,都让我倍感亲切,心中充满温暖。不论是月明星稀的夏夜,还是风雪交加的冬夜,或者是春花秋月之夜,走夜路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,也从未有过孤独的感觉。哪怕是一个人走在路上,敞开心扉,甩开膀子,迈开大步,则不论是披星戴月,还是顶风冒雪,都别有一番风趣。——“万象为宾客”,何惧之有?某个晚上,我静坐书斋,听到窗外树叶沙沙地响,透过窗户看时,外面树影婆娑,夏夜的天空群星璀璨,仿佛镶嵌在一块巨大的湛蓝色的天幕上。混杂在树叶沙沙声中的是叽叽如沸的虫鸣,还有百花湖周遭的蛙声,我突然觉得这一切太神奇了,不知不觉就出了书房门,下了楼梯,开了大门,径直走进夜色里去。我感觉就像鱼儿突然游进深水区一样快乐和自由。清凉的夜风拂过脸颊,阵阵花香袭来,人如饮至半酣的状态。周遭旷野的蝉声虫鸣,远处城市的霓虹灯火,仿佛是经过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剪辑,重叠着,变幻着,运动着。随着时空的转换,大有古人“今夕何夕”之感了!于是,脱口吟出下面几句诗来:

擲笔书斋入大荒,林中漫步径幽长。山风起伏流萤火,竹影斑斓漏月光。步履红尘浮夜色,襟怀白玉漫花香。荷塘一片蛙声沸,天上繁星似水凉。

见了我们笑得合不拢嘴。我说:“您体格真硬朗。”他指了指西厢房:“那四间房,从打地基到上顶子,瓦木匠活儿全是我一个人干的。”“瞅着我们几个,他又打趣:“要想人添膘,就得动瓦刀;要想长脂肪,就得盖新房。不论干啥活,心里得快活。”一屋子人全笑了。喝酒时他又说:“去年做的两个大花轿子,成了咱村花会的节目,抬着新媳妇扭来扭去,热闹着呢。”我爱人端杯敬他“健康长寿”,二舅仰头干了酒:“长寿不算啥,咱村九十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二十多个,赵三爷九十八岁还推一百多斤白菜赶场,挑水浇院子呢。我要是活到一百岁,在座的每人发一块奖金!”我们笑着回敬,他端起一两多的酒杯又一饮而尽。我要说合影,二舅像孩子似的把头靠在我肩上,二弟按快门,定格了那瞬间。我心里默默祝福他,也祝村里的老人都长命百岁。

二舅对街坊亲,对家更亲,谁家有事他准是第一个站出来。一九七六年我批了五间房的地基,当时二舅正当队长,整天忙得脚不沾地,我不想麻烦他,就去外面找木匠。他知道后骂我:“找啥找?我来!白天没空,晚上挑灯干。”就这么着,他起早贪黑,用二十多个夜晚完成了所有木工活。到了一九八九年,我要盖新院,还是二舅来帮忙——那年他已经六十多岁,血压高得低压高压都到了二百二。我劝他吃点降压药,别累坏了,他总嘿嘿一笑:“离阎王爷还早着呢。”

2013年我得了脑梗,二舅听说后当场就哭了。我出院第二天,他坐了一百二十里地的公交来县城看我。我像受了委屈的孩子,抱着他大哭,他也止不住地抹眼泪。

有年清明过后,我和表妹大珍约着去石景山看90岁的二姨,二舅听说了,非要跟着去。那天他精神头很足,大呼姐直夸:“你看二舅哪像八十多岁的人?爬山比年轻人还快!”

我得陪二舅两天,听他讲了好多村里的老故事。临走时他说:“今年过年的考题我又想好了。”我缠着让他透个底,他一本正经:“现在不能说,过年再给你看。”

2019年初秋,表妹突然打来电话,说二舅脑出血住进院。我和老伴急急忙忙赶到医院ICU,却进不了病房,只能扒着玻璃远远望着戴着呼吸面罩的他。没几天,二舅就走了,带着那些没公布的考题,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我的天空落落了。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,二舅会不会把那些红包题的答案,悄悄公布了呢?

盘石高地

石彦彪

大风车

无数神秘的风,高高在上,看不见,够不着。大风车爬上山顶,就是为了捕捉它,利用它。

大风车“呼呼呼”地扇动着,天空变蓝了。似乎已把高空的云朵、阴霾和空无统统吸落下来,融成高山旷野新颖的一部分。

可闭上眼,你不得不捂住心口,大风车正是那巨大翅膀衔着地球,向未知时空翱翔;有时大风车停止转动,世界沉默,地球似乎正沉落无底深渊。

山间,有人打雪仗、放风筝、野餐。而冬阳里,大风车正用叶片转动的影子刈割着贴地的萧条。

悬崖翠竹

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歇地攀登,甚至执着于攀岩。

作为草席的横截面,这翠竹无意暴露了山体的成色。亦在

庇护山之体肤,风来时以其苍劲,抽击岁月的暴虐。

冬天过去,会长出怎样的春笋?哦,别让你的想象仰望太久,

否则,这高高在上的翠色随时悬垂并滴落。

黔东草海

太阳下山的时候,我们爬了上来。远远的,

列队迎接的风力机组,正用叶片切割着高空的虚无。而我们冲上风口处,大声呼喊让心中之声汇入更加高远的神秘。

风呼呼地刮着,衣袂旗帜般毕剥作响,燥热迅速褪去;而天边绚丽的晚霞,不为所撼——人间的风,动不了它。山坳间的

摊位里,这个中年女人绽开笑容:“感谢你们,买走最后几根热狗和鸡柳,回去可以煮点饭吃了。”暮色里,我似乎看到某个村落的一股烟火气,正悄悄将自己升入夜空。此时,

她的男人,正将串在钢架上的各类风筝——收进棚架,以防繁星点化,它们连夜远走高飞……

去草海看雪

心中的理想竟契合上天之意,当我伸出双手只接住一捧空无。

据说草海是松桃的高地玉雪铺呈圣境。我们跨一步滑半步灵魂一寸寸升高。

天地白茫茫一片,那走在前面的年轻男女稍一不慎已误入天际。

红石林(一)

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,现在都可以袒露自己的心胸。

有人看见自己的心殷红如初,有人用肺叶呼吸高处的寒气,有人胸中已生出黑苔。夹缝失去土壤,走过的男女中,有人不再期盼春风。

沧桑的汉子牵来马匹,把一些人驮回消失的年代。放风筝的女孩,练习用一根细线控制鹰类。吹气球的顽童看见身边的人飞升而去。

湖里的石天鹅迟迟没有起飞,因为它发现脚下的天空深远又莫测。需要时间吧,给你五亿年够不够?置身红石林你会发现海水会枯但石头不会烂,一如人世的红心沐浴风雨耗尽霜雪仍坚硬如初。

红石林(二)

二舅一辈子傻主意不少,奇事也没少做,临老去,倒留下个没揭开的答案。村里人都夸二舅爽快,做事麻利,为人更厚道。我每次回老家,胡同里的杨婶见我抱着酒,总会念叨:“去看你二舅吧?那可是大好人,血压都高到顶了,还帮人家登高修房呢。”

“人要有志气,有德行,有孝心,才能走好运。”这是二舅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二舅在河西小学读到高小,姥爷便不让他续学了,要他跟着学木匠。老爷是木匠世家,常年给皇家做活儿,密云的五个行宫里,都留着他的手艺。起初老爷想传艺给大舅,可大舅学了没几年,抗战爆发,非要死乞白赖去当兵打鬼子。没法子,这门手艺便落到了十多岁的二舅身上。老爷总说,二舅机灵,鬼点子多,爱犯傻。

二舅的嘎劲儿,村里人谁想不到。就说日本投降那阵,家家户户都在庆祝。刚八岁的二舅跟她姥要了零花钱,跑到西聚源门店买了几挂鞭炮。老爷和姥正听着院里狗叫得凶,推门一看,好家伙——二舅把鞭炮拴在了大黑狗尾巴上,点着了火。鞭炮噼啪一响,大黑狗吓得窜出胡同直奔大街,狗吠声、鞭炮声混在一起,村里人全涌出来围观,一街的欢呼喊叫,热闹得掀了顶。

二舅是粗人,做事却细得慌。他结婚那阵,屋里要添几件像样的家具,老爷特意备了板材让他自己做,算做锻炼。二舅瞅了瞅那些板柜、桌椅、箱子、帽镜的样式,往耳朵上夹根炭笔,手里攥着墨斗在木板上划来划去。拉锯、凿眼、刨木,榫卯相连的功夫一点不含糊,一件件家具就这么成了形。如今二舅家的三节板柜、箱子、帽镜,还都完好地摆着。

1967年村里搞“四清”运动,没人闹得清楚究竟要清什么、清谁,只知道得依靠贫下中农和青年,二舅就在这年入了党——那年是村里入党最多的一年,十个生产队共十八人同时入党,我二叔便是同批。入党后二舅当选了贫协主席,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。

二舅前后三次被任命或当选为生产队长。起初是集休工挣工分,年底分红。他跟几个副队长合计:“生产队就这点地,再折腾也就几万斤粮食,要让社员日值上去,得搞副业。”他让副队长抓粮田,自己牵头办起来

木匠二舅

王长青

面加工厂、荆编厂、采石厂,让多余劳力去厂子里上工。到了年终决算,生产队日值达到一块二,在十个生产队里拔了头筹。还有一年,菜园里的芹菜、柿椒、茄子大丰收,销路却成了难题。二舅带着社员们每人背着筐,坐火车去海拉尔卖菜,来回折腾十几趟,总算把菜卖了,揣回了现金。

可傻主意有时也会惹来背运。你一心为老百姓,为穷苦人,却未必合时宜。

1976年7月23日,强降雨冲垮了潮河上游的水库,洪水像猛兽般扑来。二舅带着三十多个青壮年在大渠上守了一天一夜,直到洪水渐渐退去。这时基干民兵王老四喊起来:“潮河岸边冲上来一黑猪。二舅没多想,凭着好水性扎进水里,把死猪拽上了岸。几个人合力抬着二百斤的猪上了坝,二舅说:“抬回去拾掇拾掇,肉分给五保户,你们几个也别白忙,天落水归你们。”

没承想,这事两天后就传到了公社。说是救灾期间擅离岗位,捞死猪私分。二舅连一根猪毛都没碰,还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队里有社员不服,要去公社说理,说二舅太冤。二舅却摆摆手:“没事,刘备都有受冤的时候,我算个啥?心底无私天地宽。”

二舅妈总说二舅孩子气,就拿过年给红包这事来说:老家规矩是初一早饭后,儿女孙辈拜年长辈要挨个给红包,可二舅偏不按常理来——有几个孩子,就出几道题写在纸条上,答对了才给红包。有年春节我去拜年,瞥见纸条上写着五花八门的问题:“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哪年提的?”“一不怕苦下句是什么?”“三个代表是谁提出的?”“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?”还有“咱村多少户人口?”“后山长城谁主持修的?”“棒子的另一种叫法?”“你太爷太奶、爷爷奶奶叫啥?”“爸妈生日是哪天?”足足几十条,有国事有家事,有学问有常识。这独出心裁的红包,倒真让孩子们既长了见识,又记了家风。我问他怎么想得出来这些题,二舅拿起酒瓶倒了杯酒:“你喝了我就说。”我知道他在逗我,端起八钱杯一饮而尽,呛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笑着揭秘:“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时事,记不住祖宗,连爸妈生日都合糊,我这是让他们长记性。”

二舅八十大寿那天,我们几个外甥都去祝寿。他穿件红绸唐装,红光满面,一米八三的头个腰不驼眼不花,